

不是崔永元也可以请民工吃饭

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在北京“7·21”暴雨中受灾严重,当晚150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救了上百名危在旦夕的游客。7月30日晚,崔永元在北京丰台区南宫宾馆请参加“7·21”京港澳高速公路救援的农民工吃饭,饭后默哀一分钟。韩红还特意赶来助阵,为农民工献歌两曲。(7月31日《新京报》)

崔永元的姿态很低,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普通市民;而这些民工,则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这些依然质朴,但在长期流动中已经与时俱进的民工,恐怕不会像前辈那样感激涕零。但在这一刻,也会有一些温暖,仍会增加对城市的归属感。

这段时间,京城流行着一句话:请农民工吃顿饭。和崔永元一样,一个又一个知识精英,开始走进民工中间。这是值得赞扬的。崔永元只有一个,但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尤其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都可以也应该请民工吃顿饭。

这种吃饭首先是一种姿态。我们曾经无数次感慨,与做出的贡献相比,民工受到的肯定、拥有的地位,远远不相符。这些民工,盖起了一幢幢高楼别墅,自己却蜗居难寻;生产了一辆辆汽车,自己却常常用双脚丈量城市;建起了一所所学校,自己的孩子却无处读书……种种有形无形的歧视,更是无处不在。“城里的月亮没有乡下的圆”,这不仅源于“月是家乡亲”,更源于城市有意无意地忽视与排斥。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都在愤慨,都在呼吁打破。舆论上的呐喊是重要的,行动上的亲近也是必要的。像崔永元一样,走入民工中间,请民工吃顿饭,会让民工倍感诚意。这对于增强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对于弥补孙立平先生所说的精英和平民的断裂,有着非同寻常的好处。这种姿态是城市应该具备的,领一时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应该在思想和行动上走在社会前列,不仅语言呐喊而且行动实践,为社会做示范做引导,推动关爱、接纳民工的城市氛围形成。

这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同样是一种难得的提升。孙立平先生讲到的“精英的傲慢与冷漠”,不应该发生在知识精英身上。知识精英应该最能体现有教无类,最能响应平等博爱。一些发生在财富精英身上的局限,不应该发生在知识精英身上。知识精英应该深入到最低层,经常性跟民工与社会深层次接触。对于知识精英来说,现在这种接触少了一些。没有接触,不深入接触,知识精英所谓对社会的了解,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虚伪、肤浅、扭曲。请民工们吃顿饭,经常与民工们接触,能让知识精英保持与真实社会的互动,有利于知识精英发现、改正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不是崔永元也可以请民工吃饭,不管是谁请民工吃饭,都值得肯定和支持。当然,吃饭只是一种形式,尊重民工、接触民工,重在平时,也不只这么一种形式。 毛建国

建立一项失独家庭关怀基金如何

据专家估算,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除了中年丧子的痛苦外,如今更面临着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7月30日《新京报》)

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没有经历过幸福,而是经历过幸福后又突然失去。无论未来的计划生育国策是否会变动,它都改变了数百万失独家庭存在的事实,而且这一数据还会进一步上升。这些失独者,曾在幸福的花园徜徉,可一场突如其来灾难,带走了他们的独生子女和全家的幸福——此后,没有了生活,只是活着。这种心灵的孤独,确得人心疼。

应该说,目前针对失独者还是有一些关怀的,不过这些关怀多是自发的、碎片化的。由于地区实际不同,认识不同,财力不同、志愿基础不同,各地对失独者的关怀也就不同。即便那些做得较好的地区,这方面的关怀也多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帮助失独者解决养老、医疗等重大困难。比如北京,给予失独者每人每月200元的扶助金,直至当事人亡故为止,这已经算做得很不错的了。可在物价高企、看病难看病贵的当下,面对失独者碰到的各种实际难题,200元的扶助金多少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这一现实下,需要国家整体考虑,制定一个完善的面向失独者的关怀制度。

从精神关怀上讲,应该组织更多的亲情抚慰活动。计生、工会、妇联等部门,应该帮助失独者建立与社会的正常联系,特别是组织失独者与失独者之间的联系,让他们相互取暖。同时,从制度层面给这些失独者提供更多帮助。比如说,在乘车等公共服务上,给他们较多的照顾。

在物质帮助上,应该考虑到失独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真正深入到他们身边,了解他们的诉求所需,以提供更多帮助。有些失独者希望建立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养老院,这样既解决进敬老院的监护人缺位问题,又免于其他老人子女探望时的失落,公共资金完全也应该予以慎重考虑,有条件的就应大力满足。有些失独者面临严峻的生活挑战,这也应该得到制度性的帮助。此前有学者称,“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在一万元左右。由此可以计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元至2万亿元。”这个数据可能有些夸大,《投资者报》根据有关数据推算,社会抚养费年规模或超过200亿元。不管其数据最终是多少,数额不少是事实,去向不明是事实,因此应该由国家层面出台政策,不妨从社会抚养费中提取专项资金,建立失独家庭关怀基金,帮助失独者解决实际困难。

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表示,失独问题不解决是对人民不负责任(7月30日《新京报》)。其实,失独问题解决不好,也是对计生工作的不负责任。让失独者不孤独,考量着国家文明和国家责任。顶层设计和底层自觉互动,失独者的孤独,才能得到抚慰。

乔杉

群众需要“路灯牌”干部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街道上亮起的盏盏路灯为行人照亮了脚下的路,带来了光明。就像行人需要路灯,离不开路灯那样,人民群众需要“路灯牌”干部。

“路灯牌”干部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照亮道路。路灯照亮了我们脚下的道路,让我们找到回家的方向,不至于迷路。“路灯牌”干部就是要能够“照亮”群众思想上的路,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让群众找到前进的方向,坚定信心跟党走;要能够“照亮”群众生产中的路,指引、带领、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增收致富,逐步过上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的好日子;要能够“照亮”群众生活中的路,在群众最需要帮助、最困难的时候能够站在群众身边,走进群众中间,与群众同甘共苦,帮助群众解决好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问题,让困难群众生活无忧,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二是忠于职守。不管是雷电交加,还是风吹雨打,路灯总是无所畏惧,昂首挺胸,“忠于职守”,从不因风吹雨打而低头,从不因艰难困苦而退缩。“路灯牌”干部就是要能够爱岗敬业,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成一行,在难题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作敢为、敢担责任。三是无私奉献。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路灯总是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照亮他人,始终无怨无悔地为人们带来光明,送去温暖,从不怨声载道,从不叫苦叫累。“路灯牌”干部就是要能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无论什么时候,不管身居何职,都能够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不迷茫,不浮躁,不抱怨,始终做到满怀热情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尽心竭力造福群众。 李炳孝

入侵官网“验”假证

据报道,为实施以假乱真的目的,假证制售团伙让专人入侵政府网站,加装非法链接、篡改信息,令假证购买者能够查询到证件相关信息,信以为真。广东省揭阳市警方发现,全国已有185个政府网站被入侵过。报道称,广东警方此次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65名,收缴各类假证7100多本、假印章10000多枚。人们当然期望,类似的清网行动会成为治安常态,而今形形色色的假证件及其制售者如过街老鼠到处挨打,难以道途法外祸害社会。 吴之如文/画



如何看待“90后”不好用

“一开口便问假期怎么安排、压力大不大、工资待遇如何,对工作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福州市刚刚结束的一场小微企业招聘会上,福建飞毛腿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这样抱怨。记者了解到,“90后”不好用”成为许多企业管理者的共识,而企业招聘正面临着“90后”断档危机。(7月29日《工人日报》)

该报道以《“90后”不好用成招聘共识,企业呼吁“更忠诚更敬业”》为题目,罗列了多项“90后”不好用的弊病,如自我,素质差,缺乏认真态度和敬业精神,对企业忠诚度太低,薪金要求高,姿态傲慢,贪图安逸……毋庸讳言,“90后”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尽如人意,有的人确实敬业精神有待提高,吃苦耐劳精神欠缺,待遇期望值过高,等等。

但是,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也需要辩证地认识和对待“90后”的问题。社会进步了,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者权利意识增强了,“90后”与他们的父辈比较起来,“不好用”当属必然,无可厚非。当年,他们的父辈,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大奢望,只因养家糊口,身背蛇皮袋,盲目走四方,不计薪酬高低,略有结余就干;不计艰辛劳苦,但得能承爱受了就接手;不计歧视白眼,只求老板宽留……一句话,他们的父辈逆来顺受,不计得失,太听话,太好使。一些企业管理者之所以惊呼“90后”不好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用工思维和用工习惯,还停留在20年前的套数。今夕何年,“前朝曲”还能再唱吗?“90后”与其父辈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文化水

平高,生活理念新潮,权利诉求较强,法治意识较高,再让他们像其父辈一样,“三脚踩不出个屁”,“划个圈不敢走出来”,“赏一个子不敢讨俩”,那是万万不行了!

就拿福建飞毛腿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的抱怨来说,“90后”一开口便问假期怎么安排、压力大不大、工资待遇如何,他们这么问和计较有什么不对呢?合情合理合法,不仅可以问,还必须在劳动合同上写清楚。当然了,若是摆在“90后”父辈们的身上,那是绝对不敢这么问的,他们一定不会奢望有什么假期,更不会在乎工作压力大小,不管工资待遇多少,都会先干再说。从某种意识上说,“90后”不好用,是一种时代进步的表现,说明劳动者权利意识提高了,是好事,不是坏事。这需要企业管理者提高依法用工的意识,与时俱进,更好地尊重和关爱劳动者,维护其各项合法权益,不断提高其经济待遇、政治待遇、文化休闲待遇以及劳动环境舒适度,增强企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招得进人,留得住人,调动员工为企业贡献聪明才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当然,由于“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普遍比较优越,自力自强、敬业勤奋的意识较差,很有必要调整就业观念,不能不顾自身条件和现实可能,过度挑剔。至于报道中所说的某些“90后”,“工作与否要看他高不高兴,就算不工作家里给他的钱也够花了”,“高薪不如高兴,有钱不如高兴”,基本上都是“富二代”、“官二代”的表现,不具有代表性,当属另类。既然他们家里有钱养活他们,那就让他们当一辈子“寄生虫”,啃一辈子老好了。 石飞

让温和“参与”释放更多正能量

7月28日上午,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授权发布,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久取消有关王子制排海工程项目。当地民众抗议以维护环境的“启东事件”以如此方式落幕,有媒体评论称,“这是一场理性的双赢”。(7月29日《钱江晚报》)

理性克制、反应迅速、尊重民意……就事论事,“启东事件”确实是“理性与双赢”,但从更宽广的视域来审视,民众以如此方式“参与”到重大项目走向中来,这显然有值得思考之处。正如有媒体人在微博中梳理出事的逻辑:从什部到启东,某些地方政府给社会的印象是,他们在背着公众做违反公共利益的决定,只要出现大规模抗议,就会立刻改变之前的决定,“这样的政府形象如果从点连成片,对社会稳定将是灾难性的。”

有结果的维权,当然要比没有结果的

维权要好,但这种“双赢”,常常走了一通弯路,各方都支付了不小的代价。民众的意见最后得到尊重,但如果总是以把事情弄大、弄出社会影响,作为增重的砝码,就会成为一场很高风险的游戏,而这种风险,本是很不必要的。自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以来,既然我们的社会对于环境污染已经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情绪,为什么在涉及环境污染的重大项目决策之前,不能通过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释放民众的参与热情,反而总是要捂着盖着,让民众什么也不知道,让矛盾封到箱子里膨胀、发酵,让负面情绪不停做大,直到迅速爆发,产生破坏性力量,才不得不在民众大范围的反对面前,低下高傲的头颅,俯下身来听听民意,让让步?

一次次事件,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参与”的价值。为什么直路放在那里,有些人总不愿意主动去走,非要走这种被动的弯路?或许从骨子里,有些地方官员还有一种“愚民思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觉得老百姓只要跟着走就行了,至于怎么决策,怎么发展经济,你不必知道,总觉得可以完全代替民众关门决策、拍脑袋决策;而与其对应的考核,常常只以GDP为关键标准,发展方式、民主水平等并没有充分吸纳进来,于是便可以不惜代价地以污染换GDP,似乎只要经济上去了,什么都能上去。

所以,民主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

“新闻标题底气十足,泄愤帖无处不在,贴吧里遍布人身攻击……看着就觉得心里闷闷的,看完就想回帖骂人。”相信经常上网的人,对此深有感触。

网络风气从何而来,网络媒体“标题党”盛行是主要原因。一些网站为了吸引网民、积聚人气,不惜在标题上制造噱头,甚至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大搞“眼球效应”。

而一些网友在网上时,又往往只关注标题,不太理会内容,一见到刺激、煽情的帖子立马“血脉贲张”,谩骂泄愤,甚至公开“约架”,将网络风气发展为网络暴力,使平等交流沦为一种空谈。

如何消除网络废气?解铃还须系铃人。一方面网民面对“标题党”和“泄愤帖”,要多一点理性,多一点判断,少一点冲动,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再发言,不能因为匿名便肆无忌惮、大肆泄愤。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享受自由表达的同时也要注意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实际上,网民只有认真观察、深入思考,才不会被他人的非理性观点所左右,才能成为一名“有态度”、“有见地”的网民。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更应坚守操守、道德底线。媒体是面放大镜,有时还是哈哈镜。面对层出不穷的“标题党”,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好好反思。作为互联网企业,追求商业利益固然没错,但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意社会效益,切不可为了点击率而人为制造社会对立情绪。

互联网是亿万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网络媒体安身立命之根基,塑造一个健康纯净的网络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 白靖利

和一些官员闲谈,他们经常苦恼地表示,如今处处小心谨慎,否则不经意间就会落下“作秀”的名声,比如下乡到基层,中午时分很想到老百姓家吃顿饭,转念一想还是算了,传出去很可能又会质疑是在“作秀”;逢年过节去慰问困难群众,原本很正常,媒体报道后也往往会被质疑为“作秀”。一些官员无奈地问: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经媒体报道后,一不留神总会被贴上“作秀”的标签呢?

某县一场急雨过后,一位副县长上街,看到有树枝被大风刮断,就动手去收拾。这正好被一位记者拍到,副县长于是无情地制止说:“你是想让大家说我在‘作秀’吗?”

但凡有官员有什么非常态的表情和动作,都会有“作秀”的质疑出现,比如近段时间以来,公务员上街义务擦皮鞋、公安厅副厅长微博邀农民工吃饭、县委书记吃盒饭等。7月21日北京遭遇了61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房山成为重灾区,网上流传着一段房山公安局某副局长与抢险人员一起救灾的视频,其中显示这位副局长带头脱裤子,下到水中抢险,此举被网友质疑为作秀;北大校长(这个职位也有行政化色彩)周其凤为母亲跪拜庆生被媒体报道后,同样引来不少非议。其后,周其凤向香港学者张信刚教授赠送了一张CD,称“这是我妈妈新写的一首歌”,这首歌由宋祖英演唱。有记者欲采访此事,周其凤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他说:“我现在是笑也不行,哭也不行”,所以干脆不吱声。

为什么公众总是习惯性地去质疑官员“作秀”?现实中,为官作秀者确实并不在少数:为求政绩,大搞短期行为;为造“假”势,汇报表演,视察排练;为讲排场,一个乡党委书记也敢警车开道。官场上有光承诺不兑现的“口号秀”;有哄而起、只知表面文章的“姿态秀”;有自我吹捧的“包装秀”……难怪有人说,一些地方的官场成了剧场,一些官员成了演员。

据说,某县领导下乡调研,乡里的领导前一天就安排乡里最好的一家饭店专门到城里进了一次货,杀鸡宰羊忙了一上午,临近午饭,县领导突然提出要到农家吃顿饭。农户见县领导来家里吃饭,十分感动和荣幸,电视台记者也跟了去。吃饭时,县领导不小心掉了几粒米到桌子上,老农要收拾,县领导见有镜头对着自己,就用筷子从桌上夹起来,放到嘴里边嚼边说:“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啊!我们怎能去浪费粮食呢?”一句话感动得老农流出了眼泪,说:“您真是人民的好干部啊!”

过后,县领导对于下属的话说,别小看这吃饭,里面也有大学问、大讲究,吃饭也是一项政治。我今天中午捡米粒吃,那是必须的。如果一个干部只知道吃饱了肚子不饿,那是最低档次的吃、最没有品位的吃……

对于官员“作秀”,有论者认为,官员要和群众打交道,形象展示不可避免,“秀”在某种程度上应成为官员的必修课。本人觉得,“作秀”不是“作假”,“秀”应该是真情流露而不是故作姿态。私下和一些官员聊天,普遍听到一个字“累”,皆因少数官员从早上一出门就开始“秀”,“秀”给上级领导看、“秀”给媒体看、“秀”给老百姓看,他们不是脚踏实地一心为民,而是想方设法、费尽心机去“表演”,靠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来树立所谓好“形象”。这样的“秀”能不累吗?又怎能被百姓认可? 郭霞海

如何消除“网络废气”?

“秀”还是“不秀”真是难题

要成为一种决策习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释过,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它对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理效应,当民众可以频繁地参与到民主决策中时,表达与诉求就会进入完全理性的通道,大家聚起来、火爆起来才能被重视的局面就会改观,各个方面都能理性、温和、以有尊严的方式解决问题,就会积聚更多的良性可能。

对自我生产环境的关切,是一种本能,这也意味着“参与”,是一种无法阻挡的社会诉求,排斥阻挡、遮掩欺瞒无疑是自造舆情的堰塞湖;有序吸纳、温和疏导,才能实现更富意义的社会多赢。要温和参与,要么就会激烈参与,温和参与,释放的是正能量,激烈参与,释放的是负能量。这几年,中央一再强调参与民主决策,对于那些总是不理解其深邃内涵、总做表面文章的个别地方官员来说,实在需要多一些“不挠脑筋就换人”。 毕诗成